

解密：时任副主席王洪文失宠后做了什么？



1975年国庆节，新华社播发的国庆照片，透露了王洪文在哪里。

那是一张在上海拍摄的照片，王洪文居中，左边坐着王秀珍，右侧坐着马天水、徐景贤，背后是一批正在鼓掌的群众。照片的说明词写道：“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在上海和群众一起欢度国庆。”

在《人民日报》上，王洪文这张照片被安排在各地欢庆国庆的照片之中，并不十分醒目。而整整一年前，王洪文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主持国庆盛大招待会，他的照片印在《人民日报》头版。

王洪文已经许久没有在报刊上露面。他回上海去了。是毛泽东要他下去的。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党、政、军一把抓，他在大力整顿：“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邓小平大刀阔斧地整顿一切。他的整顿，就是整顿被“文化大革命”搞乱了的各条战线，恢复中共八大的路线。他的整顿，实质上也就是彻底否定“文革”。

王洪文成了闲人。他的工作，按毛泽东的安排，只是抓抓党校的工农兵读书班，如此而已。

王洪文半壁颓唐。本来就是杜康之徒的他，此时此刻，他更借酒浇愁。三杯黄汤下肚，牢骚脱口而出：“妈的，什么副主席，空头支票一张！”“什么主

持中央工作，权全给邓小平夺了。哼，我只落得个抓抓读书班，比司马温还不如！”

他是个看不进书，坐不住的人。闲得无聊，无法打发那漫长的时光。他从“文艺旗手”江青那里借来一部又一部外国“参考影片”看了起来。看罢电影，余兴未尽，有时还找来外国小说“研究”一番。

看电影，看小说，还算安安静静。实在太困了，闷得发慌，他去钓鱼了。钓鱼还不够味，他打鸟。这时候，他刚当副主席那阵子的拘谨、小心，一扫而光，露出了他的“原形”，犹如当年在崇明岛上一贯“自由自在”。

消息传入毛泽东耳中。毛泽东对王洪文，作了安排：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二时间下基层，三分之一时间调查研究。

实行“三三制”之后，王洪文不能在钓鱼台逍遥了。他选择了上海作为“调查研究”的场所，给毛泽东写了报告，回上海去了——为时三个半月，也就是差不多相当于一年的三分之一。

1975年8月，王洪文回到了他的“基地”——上海。王洪文在上海是怎么“调查研究”的呢？

上海市委招待处五位负责接待王洪文的工作人员何天明、葛健、陈世章、朱友生、王珏，曾回忆如下：

“王洪文，1975年夏天来上海三个半月，一家五口住在高级别墅，整天过着花天酒地的资产阶级生活。几乎每餐都要喝名酒，经常要吃山珍海味，名菜佳肴，新鲜水果，时令蔬菜。什么鱼唇、鲍鱼、干贝、海参、蛤蜊、鹤鹑、野味……他想啥就要吃啥，而且要求苛刻，非要弄到不可。一次，要吃田螺，就要农村动员农民下水摸，要吃小豆苗，到生产队组织人采摘，他要吃鲜荔枝、香蕉、菠萝，由广州用飞机带来。此外，儿子要吃石榴，也专人到苏州去买。到南通搞过蛤蜊，到宁波搞过青蟹，派人到处去买。王洪文经常设宴请他的‘小兄弟’，亲自吃喝，三个多月就请了二十多次。他以视察为名到工厂、到农村，到部队时，事先安排吃喝，要人家准备名酒名菜，每到一处都大吃大喝，常常喝得酩酊大醉，丑态百出。”

“王洪文几乎整天吃喝玩乐，钓鱼、

打鸟、下棋、玩牌、打弹子、看电影，成了他每天主要活动。一百多天之内，看了八十多部电影。他还常常硬拉着工作人员打扑克、下军棋、玩通宵。他不仅白天去打猎，有时晚上也去打，专门让人特制了聚光搜索灯。他钓鱼，让工作人员用麻油、茅台酒和面粉作鱼饵。钓不到鱼，他就挖空心思要工作人员做两只木框浮在水面，框里放上青草，引鱼上钩。王洪文一贯作威作福，钓鱼时，不仅要为他准备烟、茶、水果、桔子汁，还要工作人员把烟递到他嘴里，为他点烟，拾鱼，装鱼饵，擦汗，扇扇子。”

“他在上海三个半月，穷奢极欲挥霍，据不完全统计，就花了二万余元。……”王洪文如此吃喝玩乐，半是政治失意，半是本性如此。到了上海，人们的心目中，他还是“副主席”，还是“接班人”。他乐得借这迷人的光环，优哉游哉。

他的“小兄弟”马振龙，成了他的“后勤部长”。据上海市轻工业局三位工作人员韩仁和、刘恩仁、吴行慎回忆：“王洪文非法攫取大量国家财物。他成为副主席后，串通上海市轻工业局的马振龙，利用职权，以‘硬性索取’、‘授意试制’等手法，巧取豪夺了大型彩色电视机、红旗牌高级照相机、高级气手枪、高级手表、石英电子表、太阳能打火机、高级香烟、啤酒、糖果等大量轻工产品。就以食品一类来说，一次就拿高级雪茄烟三十五条、酒芯巧克力糖六十盒、酱菜罐头二十多瓶。”

“王洪文为了打猎，硬要给他仿制美国‘奇异牌’的聚光搜索灯。工厂只好停止部分正常生产，日夜赶制，突击一周，造出二十只，王仅进去二只，耗费国家资金一万多元。又如，为王洪文专门精制五块高级钻石牌双日历手表，调动了七个工厂、一个商店的四十余名技术人员，花费国家资金一万二千元。王洪文用的保温杯，也要给他特制，加工单位仅为制杯盖，花了半个多月时间，专门制了两套模具，这一项就耗费国家资金一千六百多元。”

如果说，在北京慑于毛泽东的威望，王洪文还不得不有所收敛的话，在上海他无所顾忌了。一班“小兄弟”围着他转，捧他，吹他。就连那个“老干部”马天水，也在宴会上举起酒杯，走到

他的面前，献媚道：“洪文同志，你到中央以后，进步真大啊！”

王洪文不忘“马老”在中共十大那关键时刻对他的帮助，赶紧举起酒杯，以吹还吹：“马老，在老干部中像你这样的精神面貌，在全国都是少见的！”

天安门刚刚过去，毛泽东病重的消息已在报端披露。1976年5月27日晚，毛泽东在华国锋的陪同下，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

第二天，新华社发布的会见照片上，毛泽东的脑袋歪靠在沙发上，眼皮低垂，有气无力。布托抵达香港，向记者透露来自北京中南海的消息：由于毛泽东健康欠佳，今后不再会见外国首脑。布托的消息，后来被证实：他成了毛泽东一生中会见的最后一位外国首脑。

失去了周恩来，毛泽东又年迈病重，中国人民忧心似焚。就在这时，中国大地成千上万个收音机里，又传出沉痛的哀乐声：1976年7月6日，九十高龄的朱德病逝！朱德追悼会，依然由王洪文主持，华国锋致悼词。

虽说王洪文仍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以副主席的身份进进出出，但是他在天安门广场镇压那革命的烈火，已使他的面目逐渐暴露。特别是4月7日下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由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那“第一”两字明确地向全国人民公开透露：王洪文已不是毛泽东所指定的继承人。

在那样愁云惨淡的日子里，中国的老百姓居然没有失去幽默感。

不能在天安门广场写诗，不能贴“炮打王洪文”大字报，老百姓们编出了一个精彩绝伦的政治笑话，辛辣地嘲笑了王洪文。

这些政治笑话没有登过报，没有上过广播，却如同链式反应一般，迅速在北京扩散，迅速传遍全国。

这些政治笑话，也许是在中央电视台播送朱德追悼会时，王洪文神气活现地主持大会，引发了老百姓们的创作灵感：

其一：王洪文当了副主席，有一天，去看望朱老总。朱老总对他那妄自尊大的神情默然无言。良久，用拐杖指了指天，又戳了戳地，依然不置一词。王洪文嚼不出滋味来，便去找邓小平。邓

小平冷笑一声，答道：“这还不明白？他是说你不知天高地厚！”

其二：又有一天，王洪文去找朱老总，朱老总对王洪文的狂妄自大冷若冰霜。忽然，他要王洪文把桌子上的一个鸡蛋立起来。王洪文苦思冥想，无计可施，讪讪而走。为此，王洪文又去找邓小平。邓小平连声说：“容易，容易”，他拿过鸡蛋便使劲往桌子上一磕，鸡蛋立住了。王洪文大惊失色，叫道：“怎么把鸡蛋打破了？”邓小平漫不经心地答曰：“不破不立，这不就立住了吗？”

这些政治笑话，虽然只是中国老百姓的即兴之作，但是反映了他们在老百姓们心中的形象：朱老总德高望重，王洪文不学无术，邓小平机智过人。

这些政治笑话，当然都是虚构的，而虚构来自现实。王洪文确实是那么个锦绣其外、败絮其中，目空一切又志大才疏的人。他的警卫员王爱清曾回忆：朱德同志逝世第二天，王洪文继续在值班时钓鱼。

在毛主席重病期间，王洪文在中南海值班看护，根本不把毛主席的病情放在心上，不安心值班。他于1976年7月上旬就把钓鱼竿拿到毛主席住地开始钓鱼。

7月中旬，王洪文又提出要打鸟，把汽枪拿到中南海，就在毛主席住地到处打鸟。在车上说，这个地方那么多鸟，没有人打，我来打。

7月20日左右，王洪文在毛主席住地值班时，又要游泳，马上从上海要来高级游泳裤，游了好几次。有一次在车上说，本来来这里游泳池的水，可以加温到三十度，他们不肯烧。

8月中旬，王洪文在值班时经常看电影，有时他亲自打电话给文化部的刘庆棠要电影片。有一次他在车上说，今天又看了个《基度山恩仇记》，这个片子很有意思。还说抽时间把这本书和《红与黑》这本书看一下。

8月20日左右，王洪文在值班时早晨五点钟就打电话，叫工作人员给北海公园联系，要去北海公园钓鱼，联系后，下午三点左右就去了，连钓了两次。

毛主席逝世，开了追悼会不几天，王洪文就在他自己的住地地下象棋、看电影，又到八一靶场去打靶。这位副主席，已成了十足的公子哥儿！

元帅授衔内幕：毛泽东放弃邓小平擦肩而过

1955年2月8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该《条例》明确规定：对创建全国人民武装力量和领导全国人民武装力量进行革命战争、立有卓越功勋的最高统帅，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军衔；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按照这一规定，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完全应该授予大元帅军衔，但毛泽东自己放弃了。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除了后来被授予元帅军衔的朱德等10人，如果授予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包括授予粟裕等战功赫赫的高级将领以元帅军衔，亦符合基本规定。

就首次授衔这一历史事件而言，1955年1月中旬的中共中央军委座谈会应该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因为它框定了授予元帅军衔人员的范围。1月14日和15日，中央军委座谈会开了两天，具体对授予元帅、大将、上将军衔的人选进行研究。会议由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主持。经过充分研究讨论，最后取得一致意见：授予现任军委主席和军委委员元帅军衔。元帅军衔又分为两级：大元帅和元帅。16日，彭德怀、罗荣桓联名将所提名单和意见报告毛泽东。

1954年9月重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是毛泽东，委员有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11人，未设副主席职务。按照军委座谈会确定的原则，刘少奇、周恩来、粟裕不是军委委员，当然也就不在元帅人选之列。因此，彭、罗提交的报告中，刘少奇、周恩来、粟裕没有被纳入元帅的初步名单中，而邓小平名列其中。

虽然在报告中没有明确元帅军衔是授予军委主席毛泽东，但这应是无悬念的。因此，毛泽东不要大元帅军衔，最早也应在1955年1月中旬之后的事。这里有个问题：毛泽东表示不要大元帅军衔，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表示不要元帅军衔（如果有关回忆准确的话），也不应在同一时间。因为开始要授予毛泽东大元帅军衔，授予邓小平元帅军衔是明确的，而在最初的方案中就没有考虑授予刘、周、粟以元帅军衔。同样的道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也不会同一时间表示不参加元帅军衔的评定。总之，虽然我们不排除排除这样一种

可能性，即在评定元帅军衔过程中，人们会提出授予刘少奇、周恩来、粟裕等元帅军衔的议论，甚至在提交元帅名单到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审议时，与会者也有可能提出这种看法，但我们没有看到中共中央军委、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在研究元帅人选时做出过授予他们元帅军衔的初步决定，也没有见到国务院和全国人大有过这方面的提议。1955年初军委座谈会提出的大原则被中共中央采纳后，直到9月授衔时也没有改变，有的只是微调。

从中央军委座谈会到正式授衔不到一年的时间，元帅人数不是增，而是减的问题。按照中央军委座谈会的意见，元帅本应是11人，到正式授衔前半个月，11个元帅变成了10个元帅，邓小平与元帅军衔擦肩而过。如果没有周恩来的坚持，则共和国元帅就不是10个元帅，而是9个元帅了。

由于各方面的努力，授衔准备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能够按计划于1955年10月1日国庆节前举行授衔、授勋典礼。8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军委提出的授衔名单。因此，彭德怀要罗荣桓、宋任穷等代起草国务院总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呈请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函稿。9月3日，罗荣桓等将起草的函稿呈周恩来并刘少奇审查修改，并提出由国务院秘书处转送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罗荣桓等在该函稿中明确提到：“中央已决定现任军委委员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11位同志均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这一文件告诉我们，直到9月3日还是准备授予11位元帅，邓小平还在元帅名单之中。但此后不久，元帅名单又有了新变化。

在决定实行军衔制时，中共中央决定，已到地方工作的部队干部原则上不参加授予现役军衔，考虑到历史情况和现实需要有的人可以授予预备役军衔。陈毅和邓小平，除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与军事工作直接有关外，主要还是从事政府和党务工作。陈毅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在军队中都没有其他职务。按照这一原则，既可以给他们授军衔也可以不授。

9月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会议的议题之一是有关授予元帅军衔问题。9月11日晚，中共中央书记处

再次召开会议，专门讨论授予元帅军衔问题。因周恩来在北戴河，9月9日和11日的这两次书记处会议，他都没有参加。9月11日周恩来打电话给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谈了自己的意见，主张授予陈毅元帅军衔。周恩来说：“军衔授予，对陈毅同志现在和将来的工作均无不便之处，平时可以不穿军服（必要时穿）。苏联的布尔加宁同志原也有元帅军衔，现在他做部长会议主席的工作就不常用元帅头衔了。可以说是一个例子。”

根据目前见到的材料，笔者判断，9月11日晚的这次会议，即举行授衔、授勋仪式前的半个月，中央才最后敲定授予朱德等10人元帅军衔。大致可以判定，在这两次会议上，中央决定邓小平不授元帅军衔。同时，对是否授予陈毅元帅军衔也出现了不同意见。因此，才有了周恩来9月11日主张陈毅还是授衔的电话。也就是说到9月中旬10个元帅才最后确定下来。

9月16日，国务院第十八次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授予解放军有功人员勋章的第一批名单等问题时，主持会议的陈云解释说：有些同志曾长期在解放军中服役，现在转业了，没有授予军衔。授元帅的同志定为10位，也不是可以授予的。如邓小平同志，在革命战争中对建军和指挥作战都是有功的，也是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考虑可以授予，但他现在的工作主要是做中央秘书长，搞个元帅不好，他自己也认为还是不授予好。毛主席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可授大元帅，但经中央和毛主席本人考虑，还是不授了，将来需要，什么时候授都可以。同一天，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授予朱德等10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9月23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审议了周恩来的建议，决定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同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议，发布授衔命令。9月27日，在中南海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典礼，朱德等10人被授予元帅军衔，刘伯承、林彪因病未出席授衔、授勋典礼。



老先生通常会和被召见人员闲谈家常一番，例如他会问人家你贵庚啊？你宝眷啊？平时读什么书啊？

文告上的字斟句酌，让人直觉蒋介石是一位十分守旧的人；而他在接见文武官员时，更有一套他自己立下的规矩。

大部分蒋介石要召见的人，多是最近要调动职务的高级文武官员。召见前几天，“总统府三局”的主管人员，早就把公文准备妥当。比如说，某单位要晋升一位首长，但有好几位适当人选，通常有关单位会在众多人选中，选出二至三个，呈报“总统府”，然后，由“总统府三局”安排“总统”接见这两位候选人员的时间。在召见当天，三局交际科人员就用毛笔写好一张大签呈给“总统”。在“总统”上班前，一大早就交由我把这份公文摆在“总统”的大办公桌上，在“总统”抵达办公室之前，预备接见的人员，早已经由交际科人员带领到“总统府”会客室等候。

一等蒋介石上班，并且在办公室坐定，打开有关的人事档案呈（上面记载了今天要召见官员的相关资料）。这时，“总统府”武官知道，“总统”已经接见召见人的相关资料过目一遍，知道“总统”想要召见今天约定的人，就放开嗓门唱名，将在会客室等候的待召见人员一一领进办公室。这时，蒋介石通常是神闲气定地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静待被召见人员进办公室，一旁的秘书秦孝仪、侍卫长二人也站在一边陪见。

有的人因为是第一次被老先生亲自召见，加上老先生有种不必造作就会自然流露出来的慷慨威仪，被召见人员有的会一时紧张，经常发生令人啼笑皆非的情况。

“总统”的办公室入口处，有一道矮门框，高度约一英寸左右，有的被召见人员心里七上八下，而老先生的办公桌就位于大门进去的正前方，有的人一见老先生就坐在正对面，双脚一时不听使唤，不小心踢到门框，用力过

猛，当场就扑跌在老先生面前。

老先生通常会和被召见人员闲谈家常一番，例如他会问人家你贵庚啊？你宝眷啊？平时读什么书啊？有的被召见人员，不习惯老先生的口音，或者听不懂什么叫“宝眷”，愣在那儿答不出来，那就会影响他自己的成绩和晋升的机会。有的人比较清楚老先生的个性，当他问起你平时看些什么书的时候，受召人倒不一定一定要说在读什么了不起的世界名著，只要说我在研读“领袖训词”，老先生便连连夸赞“好，好，很好”，此人已然成功了一半。

尽管蒋介石接见这些文武官员时，总是脸色严肃，表情慎重，但是什么贵庚、宝眷、看什么书的问题，几乎是任何人都会被问到的问题，至于一些别的问题，当然会有小差异，所以，当前面被召见人员见出来时，后面在等候的被召见人员就会很紧张地上前打听，究竟“领袖”适才都问了哪些事情啊？

因为，蒋介石召见人，通常不过三五分钟的时间，他喜欢从一个人的长相、气度、神态和谈话内容上，去决定一个人能不能赋予重任。所以，假如一个人平时表现再怎么出色，可是假如当天晋见时，表现怎么，老先生拿红铅笔在别人的名字上打一个大圈，那他就前功尽弃了。

所谓察言观色，老先生对这套传统的用人哲学，似乎特别重视。

本版文章均来自网络，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不代表本报的观点和看法，与本报立场无关，文责作者自负。

蒋介石用人哲学：见人必问三个问题